

## 浅论隋代后期的文学思想

谭丽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探讨隋代后期的文学思想离不开对隋炀帝、刘善经和王通三人的研究。隋炀帝杨广兼具天子和诗人的双重身份, 对隋代后期文坛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 他颁布的各项文化政策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氛围; 另一方面, 他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所展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影响着上层士族。在这两个方面的互证中, 可以看出炀帝开放创新、融通南北的文学思想。刘善经作为文艺理论家, 从文学本位出发, 关注诗歌的声律问题。王通带有儒学传统色彩的文学思想集中表现于《中说》一书, 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倾向。

**关键字:** 文学思想 隋炀帝 王通 刘善经

**中图分类号:** 750.14      **文献标识码:** A

隋代自灭北周建朝至被李氏推翻, 仅仅 37 年, 虽国祚甚短, 却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时期。一方面, 其结束了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实现了南北的大一统; 另一方面, 其在政治、经济建设上的一些举措具有无可争议的开创性。同时, 隋处于南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发展的过渡阶段, 在文学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隋代前期, 文帝大力倡导“斫雕为朴”的理念, 下令摒弃一切“浮华”的事物和行为。台阁重臣李谔在此大前提下的奏疏《上高祖革文华书》(或称《上隋文帝论文书》),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一种功利的诗教文学思想。将政治教化功用视作文学的根本职责, 否定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意义。与之相比, 隋代后期的情况则更具生机和特点。

### 一、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修通运河”、“修建东都”、“三游江都”、“三征句丽”等词与隋炀帝紧密相连, 他是大多数人印象里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也有不少人为他辩白, 说他有贤德、有抱负、有谋略、有才能, 为经济繁荣、江山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 朝代的更迭不过出于历史的必然。不论历史对他的评价争议几何, 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得到了诸多的肯定。《隋书·炀帝纪》记载他“好学, 善属文”, 《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初习艺文, 有非轻侧之论, 暨乎即位, 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 并存雅体, 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 而词无浮荡, 故当时缀文之士, 遂得依而取正焉。”沈德潜称赞他“能作雅正语, 比陈后主胜之”。刘师培说:“隋炀诗文远宗潘、陆, 一洗浮荡之言。”兼天子之尊和文坛领袖于一身, 炀帝的文学思想在隋代后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缺乏记录炀帝文艺思想的直接文献, 所以我们只能从他的创作实践和政令推行这些侧面来发掘、总结他的文学思想。

#### 1、隋代后期政治文化政策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 各项政策有所改动。首先是士族政策的改变。一反文帝时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 扶持重用江左士族, 拉拢山东士族, 疏远文帝倚重的关陇士族。炀帝对江左士人的突出优待, 与他平陈之后长年镇守江都, 领略江南文化的优点, 喜爱江南文化不无关联。早在杨广还是晋王时, 身边就储有许多江左优异文人, 登基以后一些江左士人的地位也

水涨船高，晋为宠臣，《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所载诸人就很典型。如：诸葛颖，丹阳建康人，祖、父皆仕于梁。颖少能作文，侯景乱中入北齐，待诏文林馆。周灭齐，颖长期不得调，潜心研读，杨广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广为太子，除药藏监，广为帝，颖升著作郎，出入卧内，甚见亲重，“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帝常赐颖诗，其卒章曰：‘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见待如此。

其次是宗教政策。炀帝虽然沿袭了文帝佛道儒并尊的态度，但是，其一方面在顺序上有别：改文帝佛道儒之序为儒佛道。另一方面，在对佛教的推崇倾向上有细微的差别，如兰吉富先生在《隋代佛教史述论》一书中所说：“大体而言，文帝的奉佛态度，系沿北朝佛教风气而来，具有北方平民佛教之倾向。而炀帝则较具有南方佛教之习气，好义学，尚清谈。此从二帝在弘法上所表现的具体成绩也可窥见端倪。文帝在所度僧尼，造寺、塔、像方面的成绩远为杨广所不及，然而在敕修经论一事上，则不如炀帝。”此外，佛教在隋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等教派。隋炀帝尤其欣赏天台宗以折衷的态度调和三教，破斥南北，以方便圆通为名，可任意发挥的宗教思想体系，还是天台智者大师智顓的虔诚弟子。

再次是学术文化政策。《隋书·儒林传序》载“师说纷纭，无所取正”的情况，体现出文帝时南北学术差异突出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文帝时期的关陇文化中心论，对江左、山东文化的轻视导致“江南、河北义例不同”的隔阂。炀帝则关注支持南方学者的研究，如命江南学者潘徽等编纂《江都集礼》。又让南方学者参与改革礼制，如大业元年依靠虞世基、许善心等江南学士对舆服制度的修订。在炀帝的推动之下，南北学术有了更多的交流，逐步走向通融。

最后是科举制度的推进。炀帝大业五年六月辛亥，发布《四科举人诏》，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自此，朝廷用人取士的方式，从隋初文帝时注重德望转向才艺表现。这种不分地域、门第的选才方式，尤其是以诗赋为主试策，为久习南学的江南才子打开了入仕的方便之门。相应的，士大夫除了勤习书籍之外，还需要文笔的切磋磨练，这就出现了文人之间相互品评、切磋技艺的文学唱和，为南北文人交流进一步提供了条件。

## 2、炀帝的文学创作

首先是诗歌创作。隋炀帝杨广的诗，今存四十三首，其中乐府诗十九首，古诗二十四首。无论在皇室宫廷的作家中，还是在整个隋代的作家中，数量或质量上都堪称一流，独树一帜。然而，就像杜晓勤先生指出的那样，“隋炀帝是隋代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诗人。他虽然出自关陇军事豪族集团，但又迷恋江左文化艺术，善诗能文，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很高，颇兼南北诗风之长。而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诗文，无地域之限制，诗风之偏见。三地诗人齐聚京师，互相唱和，切磋诗艺，多赖其力。然而，很久以来，人们由于受到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对炀帝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在南北诗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够，评价亦甚低。”

这四十三首诗，和他一生的活动关联密切。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记游诗、宫体诗和边塞诗三大类别。记游诗多表现江南的独特风情，如《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阜麦陇送迎秋。  
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这首诗不仅对仗工整，音律和谐，而且意境清新疏朗，风格自然清丽。读来色彩明快，

错落有致，让人能将江南的独特景致风物尽收眼底，品味到江南生活的韵味。由此表现出作者善于运用刻画景物和营造独特意境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体会，同时，还体现了诗人浑然天成的高超艺术技巧和对清新自然、素朴清秀审美风格的追求。与游记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他的咏物写景诗，如《晚春诗》、《悲秋诗》、《冬夜诗》等等。

炀帝的宫体诗，一部分实属娱乐浅薄之词，如现存的《喜春游歌二首》，描写宫女面貌娇俏、舞姿曼妙、服饰华美等，内容空洞，乏善可陈。但是，这部分所占的比例较少，更典型的还是脱去浮靡脂粉之气、浸入北方气质的宫体诗，如《春江花月夜》二首、《锦石捣流黄》二首等。《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黄昏远眺长江，暮霭沉沉，江面平坦宁静，春花盛开，花团锦簇。春夜潮生，水波激荡送来交辉的月华星光。寥寥四句，让人如坠江月胜景之中，领会到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美景江山的眷恋之情。此诗简约素净，柔美坚致，意境浑融，气象壮大而又厚重沉稳，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范之作。另外，此诗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张若虚的同名诗篇，不论是在意境情感还是审美风格上，都有相近之处。清人朱乾甚至在《乐府正义》中评道：“唐人能手，无一过之。”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炀帝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视野开阔，情感丰富，因此成就了他诗歌内容的充实丰富和审美风格的多样化。他的边塞诗代表性名篇有《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等。其中《饮马长城窟行》：

萧萧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捲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枹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乃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的前四句，交待时令和远行的目的，为全诗的总起。“岂台”八句，写筑长城的缘由和自己所思所想。认为这是一件使江山、百姓“万世”永安的策略，所以自己哪里敢害怕劳身“焦思”，而在京都高枕无忧呢？因此就亲自秉节北游，指挥千军万马，在千里荒漠修筑长城，演习士兵。“山川”八句，写大军在边境演习的壮观景象。“枹金”四句，写其指挥千军万马击鼓而进，鸣金而退的情状，可以想见其骄矜得意之色。“秋昏”二句，以“云昏”、“月暗”来渲染大军压境的杀气和威力，写得气势凛然，形神兼备。“缘岩”八句，写突然烽火燃起，初以为敌人入侵，原来是单于率兵朝谒。边境一带已经除尽“浊气”，“晨光”

高照了，这正是修筑长城的效验。最后两句，以凯旋告功作结，与“树兹万份策，安此亿兆生”遥相呼应。这首诗笔力健拔，气势奔放，格调雄健，表现了一种“雄壮”、“俊健”、“清拔”的诗风，成为千古名篇。故唐之后的人评价极高“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与其诗风相近的还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等诗作，可见炀帝所作诗歌，风格取向随着题材、功用而定，是作诗的多面手。

其次，炀帝不但诗歌富有鲜明的特点，而且散文亦表现出非凡的文采。其散文数量较多，最多的是诏制书敕等日常格式化的公文性文章。这些文章皆典则、雅正，其中《建东都诏》和《手诏劳杨素》两篇因骈散结合，语言平易谐畅，毫无雕琢之迹，风格刚健质朴有余，素被称赞为骈文中的佳作。还有大量与佛教僧侣来往的书信，尤其与智顛的三十五封书信，具有不着铅华，朴素自然的特点。另外，还有两篇赋《归藩赋》、《神伤赋》，现今已亡佚。另有一篇《伤子铭》；一篇《隋秦孝王诛》。其中《伤子铭》作于炀帝第三子夭折后，语言平易，感情真挚，文风素朴，表现出对佛教极大的虔诚。《隋秦孝王诛》对仗工整，音律和畅，引经据典，文简意繁，毫不雕琢，并存雅体，词无浮华。与文帝的质朴相比，更多了南朝清新秀丽的气息，可谓融合了北人的刚健质朴和南人的清秀风韵。

### 3、互证分析

通过对炀帝文化政策和创作实践的条分缕析，可以看到他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尤其可知其文学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南北文风融合的追求。不论是重用江左文士、推广江左学术文化，还是他本人创作实践中的审美追求和作品呈现的文学风貌，都表明炀帝着力于推动南方的清新优美与北方的质朴刚健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走向交融。他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具有融合南北两长的特质便是最好的明证。

炀帝文学思想的另一个内容是非功利的文学观。一方面，从炀帝的创作实践看，大多作品属于“缘事而作”，诗歌起到抒怀之用。另一方面，《隋书·王胄传》记载：“（炀）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气高致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是隋炀帝对诗歌的评赏标准，也可以说是他赞赏的诗歌创作原则，或者说是他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理想。以文学的角度和标准评判文学创作，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此外，他不以政治手段阻碍文学自身发展之进程，一反隋代前期诗教化的文学思想，还文学创作一个宽松的政治氛围。

## 二、王通的文学思想

王通是隋代大儒，在当时有“王孔子”的美誉，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其思想集中表现于其门人编纂的《中说》一书。

### 1、“贯道济义”的文学功能论

王通继承了前代“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来对文学进行评价，提倡文以贯道，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王通在《中说·天地篇》云：“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王通提倡文学必须“贯乎道”，“济乎义”，以“志道依仁”为旨归。王通认为诗能匡扶时政、教化世人，《天地篇》还指出诗必须“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其《续诗》有“四名”、“五志”之说：“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海立诫于家也。凡此四昔，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

或诚焉，是谓五志。”（《事君篇》）这显然沿袭《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论诗标准。王通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轻视、忽视文学的审美作用，是一种极端的功利文学观。

## 2、“约达典则”的文学风格论

王通认可的文风比较广泛。虽然他说“吾师也，辞达而已矣”（《天地篇》），却又说荀悦“史乎史乎”，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事君篇》）。荀悦文风质朴；陆机则文采华美，或被赞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或被贬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对此二人评价都甚高。王通最欣赏的文风是简约、典则，他十分欣赏曹植、颜延之、王俭、任昉“深以典”、“约以则”（《事君篇》）的风格，认为“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篇》），说《续书》中的“策”是“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问易篇》）称赞其祖父所作碑文“典以达。”（《王道篇》）对“傲”“怪”“怨”“淫”（《事君篇》）一流的浮靡文风非常不满。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指出：“建安以情，正始以哲思，西晋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则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西晋的张协、潘岳、陆机等人，诗文求美求工，刻意地讲究声律和色泽。这种文学之风尚愈演愈烈，形成不可遏止的潮流。王通提倡典则简约的风格，实际上一方面是对六朝这种“文尚骈俪，诗尚排偶”的绮靡之风的必然反拨。另一方面，则是迎合他的功利文学观、实现文学“贯道济义”功能的最佳选择。后人更是沿着他的思路，在理论上将察经明道的内容与简约典则的风格统一了起来。

## 3、“文如其人”的文学人品论

《事君篇》记载：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王通在此对魏晋南北朝的二十二位文人进行评价，其中对曹植、颜延之、王俭、任昉是持赞赏的态度，其余的则都被否定。显然，王通是用“文如其人”的观点来分析这些文人的人品和文品。王通继承了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思想，从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出发，认为只有君子般中正平和的人格规范，才能创作出“深以典”、“约以则”的作品。至于评判人品的具体标准，深入探究，不难发现“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其出发点。

通过以上对王通的文学观、审美风格和独具特色的文品人品论的分析，发现其文学思想是以儒家之道为总纲，又以其为旨归的。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有作为儒者的立场因素，也有文学环境的推动，虽然较好的阐发了儒家的理想文学观，但是逃不掉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和保守倾向。

## 三、刘善经的文学思想

刘善经，生卒年不详，大约隋炀帝中期在世。《隋书·文学传》有关于他的简单记载，“博物洽闻，尤善词笔。历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遗憾的是，上述之书如今皆已亡佚，唯有《四声指归》的主要材料保存在日僧空海所编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中。经王利器先生考证，《文镜秘府

论》南卷的《论体》、《定位》二文为《四声指归》之文，其中体现了刘善经的文学思想。

刘善经的文学思想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南北朝文学的得失批评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对文章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理解上。刘氏提出文章分为六体，每一种文体都有特定的美学要求，《论体》有言：“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至焉。”其中明确指出“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认为诗赋的美学要求就是“绮艳”。正因为认识到每一种文体都有特定的美学规范，刘氏同时提出：“苟非其宜，失之远矣”，也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犯错，六体分别失于“缓”，“轻”，“淫”，“诞”，“阉”，“直”。从以上的一番论述还可以看出刘善经对南北朝文学的批评：如“逞欲过渡，淫以兴矣”之辞直指南朝文学的失当之处；“体尚专直，文好指斥”之语，更是吻合北朝文学在功利思想的阴霾下显得过分直露而失去审美属性的实际情况。由此可知，刘善经对文学批评的言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相联系，有一定的时代性。

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氏主张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论体》说：“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亟将用心，不可偏执。何者？篇章之内，事义甚弘，虽一言或通，而众理须会。若得于此而失于彼，合于初而离于末，虽言之丽，固无所用之。”关于写作的方法，《定位》也说：“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陈之有次，阶梯之有依也。”构思是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于篇章之结构直接关系到内容的表达。语言以传达内容为第一要务，若有失于此，即使再华美也没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氏非常重视文义的表达，但是他也没有忽视音韵的问题。《论体》云：“若文系于韵者，则量其韵之少多。若事不周圆，功必疏阙；与其终将致患，不若易之于初。然参会事情，推校声律，动成病累，难悉安稳。如其理无配偶，音相犯忤，三思不得，足以改张。或有文人，昧于机变，以一言可取，殷勤恋之，劳于用心，终是弃日。若斯之辈，亦胶柱之义也。”齐梁以来随着四声的发现，音韵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成为影响诗歌形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南朝后期诗坛形式主义泛滥，过度重视音韵导致了以音害义的情况。南风北渐之后，这一情况亦多见于北朝诗人创作中。刘善经以生动的语言刻画了当时部分文人一位注重音韵、昧于机变的形象，明确指出不能因为音律协调而损害文义，当两者不相符的时候要及时修正。

从《四声止归》对大量齐梁声病遗说的保留可以看出刘善经对声律问题的重视，而非一味强调内容不顾形式。因此可以说，刘善经基本上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讨论文学的。

综上所述，隋代后期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隋炀帝杨广、刘善经和王通三个人身上。从炀帝的文化政策和诗文创活动分析出他非功利、开放包容的文学思想。从刘善经结合实际的诗学论文主张中看到他较为客观地阐述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具有文学本体论性质的思想倾向。隋末大儒王通在《中说》一书里反映出诗教化的文学思想，具有一些保守的倾向。虽然他们的文学思想没有根据魏晋文学发展的趋势，给文学发展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在某些具体的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如炀帝对南北文学合流的推动，刘善经声律论对唐诗声律规范的影响等。

#### 参考文献：

- [1]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王通.文中子中说[M]郑春颖,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4](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5]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6]李建国.隋代文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6.
- [7]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的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1999,36(4).

##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Late Sui Dynasty

Li Ta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udy of Emperor Yang, Liu Shanjing, and Wang Tong to discuss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the late Sui Dynasty. Emperor Yang Guang, who was both the son of the emperor and a poe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late Sui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cultural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him influenced the atmosphere of literary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esthetic taste showed that his literary ideas influenced the upper class. On the other h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esthetic taste showed that his literary ideas influenced the upper class people, which could be seen from the mutual evidence of these two aspects. As a literary theorist, Liu Shanji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und rhythm of poetry from the literary position. Wang Tong's traditional Confucian literary idea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book *Zhong Shuo*, which showed a conservative tendency.

**Keywords:** literary thought, Sui Yang Emperor, Wang Tong, Liu Shanjing

**作者简介(可选):**谭丽,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7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15274997821